

方舟之外

論朱天心的近期寫作

何春蕤

以朱天心作為八〇、九〇年代小說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本身便建立在一連串發人深省的問題上：為什麼選擇朱天心為焦點？她的作品在何種歷史社會脈絡中被視為積極介入公共論述？批評者對她的涉入作何種詮釋挪用？這些詮釋挪用期望形成何種社會效應？這一系列的論述交鋒又如何「呈現」了八〇、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我對朱天心的閱讀正要由歷史社會的角度出發來嘗試處理以上的問題。

一九八九年六月底朱天心以〈佛滅〉一文在中時人間副刊連載五天，引起文化圈內的莫大震撼。由於小說影射實際的人與事，圈內人有的忙於對號入座式的窺秘，有的則指責朱天心缺乏創作道德。除了操守方面的批評之外，在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後解嚴氣氛下，文化人的注意力也集中到朱天心當時一連串與反對運動相關的小說上，〈佛滅〉中反對運動者言行上的巨大矛盾，〈新黨十九日〉中反對運動與股票族的虛妄狂熱，都被視為朱天心的某種政治立場的宣告，比起稍早帶有某種悲劇情懷的〈我記得〉：

…和不夠深刻緊湊的〈十日談〉，看來更加明顯的醜化反對運動。

不管這次的〈佛滅〉爭議勾起了多少對七七、七八年「三三集刊」時代朱天心「御用文人」形象的不利回憶，批評者卻不得不承認她的寫作技巧已脫離了七〇年代青春夢囈的渾然無覺（註一），而揮灑出一片即使批評者也不得不正視的絢麗色彩。面對這麼一支可能造成殺傷力的利筆，各方的批評者於是在不同的考量下嘗試採用不同的思考框架來理解朱天心的創作並提出因應的期許。

詹愷苓在反對色彩頗濃的「自立副刊」以〈浪漫滅絕的轉折〉來追溯朱天心的寫作生涯兼評《我記得……》（註二），她一方面指出朱天心早期的作品出自「對應鄉土文學，企圖創造一個以大中國文化為中心的行動原則的努力」，認為朱因此在作品中傾向於化約社會時代的問題為個人情愛的感懷；另一方面則嘉許朱天心在《我記得……》一書中已開始走出「三三」文學觀的陰影，以憂鬱的沉重來面對本土化、民主化浪潮拆解大中國情結之後的茫然。詹且期許朱天心能以對社會的付出與參與來找到自己的陽光。

《我記得……》一書在八九年下半年出版後頗受各方矚目，風評亦佳，因此詹愷苓書評對當年「三三」文學觀進行大篇幅意識形態分析，所造成的實際效果是揭露《我記得……》作者的前世以便合理的召喚其今生。

相較於詹愷苓的意識形態分析，洋父針對〈佛滅〉一文所寫的評論就明顯的擺下政治鴻門宴（註三）

。他認為「朱天心其實正以一種四十年戒嚴體制壓迫而形成的政治冷感變形而來的『虛無主義』嘲諷反體制運動」，而洋父暗示〈佛滅〉男主角半自欺式的反體制運動仍然比朱天心犬儒式的諷刺天才更為積極面對台灣所發展出來的各種不合理狀況。

洋父在政治光譜上為朱天心所設定的定位在某個程度上代表了文化圈內許多人閱讀《我記得……》時的關注。畢竟，政運與社運在八九年的豐碩發展是推動台灣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而朱天心小說中對運動熱情的質疑與嘲諷立刻被歸類為保守派的陰險抹黑舉動。

圍繞著《我記得……》的政治立場所衍生的討論可說是八九年以後政運在島內加緊鞏固其運動主導地位的徵兆之一，但是文化人抗拒政運壓縮社運空間的傾向也大有人在。何春蕤便在〈荒原女人〉一文中凸顯朱天心小說中對婦女問題的真切描寫（註四），她指出政治定位並非唯一的閱讀角度，而事實上，〈新黨十九日〉及〈鶴妻〉對新的社會形態中家庭主婦日趨邊陲荒蕪的生活有極為深刻的呈現，是目前大量關注職業婦女生活的媒體文化中少見的。呂正惠在細數戰後台灣文學經驗之時，也贊許朱天心在女性人物的描繪上，「不由自主」的呈現了突破的寫實格局，以她對女人特殊的感受力創造了像〈佛滅〉女主角那樣令人困惑而著迷的原始本能女性（註五）。這些在「政運優先」的氛圍中堅持婦女議題的評論，為朱天心的創作意義增添了不少複雜性。

如果說《我記得……》鮮活的呈現了在歷史洪流中活著的有血有肉的主體如何在個別的脈絡中與歷

史事件交接糾纏，因而在八九年的政治氣氛中被視為是對主流議題的直接評論，那麼一九九二年集結成書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便更大膽的祭出熱門燙手的族群問題來為朱天心最近的作品著色。這本小說集的單篇作品只有一篇處理眷村主題，但是麥田出版社的行銷策略顯然希望扣連最流行的論述，所以不但以眷村文化為主打，更為本來沒有預設主題的文集創造出「畸零族群」一詞來描繪朱天心的寫作對象（註六），從而凸顯朱天心的邊緣形象，準備迎接另一波政治掛帥的評論。

有意思的是，在《我記得……》時代尚被視為與權力集團掛鉤的朱天心，到了《想我》時卻被呈現為專心的強調作品中的邊緣與畸零色彩。這當然不完全是個人的抉擇；更重要的是，這個位置上的戲劇變遷也標記了台灣在不得不國際化、自由化、民主化以謀經濟發展的脚步中調整各種既有體制以及與它們相應的權力分配，而在此調整過程中，朱天心發現自己認同的社群已被擠到邊緣了。

以「畸零族群」一詞來串連邊緣位置上的各種人群（包括政治犯、同性戀、袋鼠媽媽、眷村子弟等等）不但在論述上顯示了某一程度的進步性，也提供了一些文化與論述資源供弱勢群體發展結盟關係之用；於是我們在近期一連串有關族群政治的討論場合看見朱天心的積極參與，也讀到她對族群政治的謹慎態度。這位小說家不再自限於寫小說而已，她又再一次用小說創作之外的具體言行投入了激烈的社會辯論（註七）。

朱天心對族群議題的熱切參與和高曝光率當然不會逃過批評者的注目。在國家認同升為首要議題的

政治社會氛圍中，任何嘗試建立台灣文學史的努力都必須認真思考如何整合不同社會族群在過去四十年中創造的文化現實，於是邱貴芬選擇了由「女性」「台灣人」的立場向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喊話（註八），而朱天心近期現實性濃厚作品中所針對的、在洋父口中所說的「反體制運動」，也因應時局而被轉化為邱貴芬筆下的「本土化運動」。

就邱貴芬的閱讀而言，朱天心作品中特有的敘事觀點、文類、結構，都和朱天心對國家定位及性別定位的猶豫矛盾有一定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朱天心在拒斥性別角色定位時所發展出來的「閉室恐懼」其實源自眷村經驗所特有對國家定位問題上的「鎖國恐懼」，從而形成她在敘事觀點上拒絕女性定位，在寫作形式上益趨男性文類的議論散文，在題材上以氾濫的文化符碼來為閉鎖孤絕中的主體提供注定的失敗的抗拒。邱貴芬認為，有鑑於台灣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日漸明確的位置，朱天心實在不必再受困於閉室或鎖國恐懼，而應該結束（自我）放逐，在建立台灣主體性，即台灣國家定位的本土化運動中發現歸宿（屬）感。

邱貴芬這篇評論在當下的議題氛圍中試圖將朱天心的小說創作扣連到國族政治的實際操作，在說理及論證上都呈現了可觀的高度，對朱天心的召喚也是同情而誠懇的。但是，島內自由派對族群話題的討論只聚焦於如何尊重族群差異，達成族群平等，並未試圖解析族群與性別、階級等社會指標間的相互滲透，更未針對或挑戰這四十年來造成台灣族群問題的國族同質化（建立國家認同）及資本主義現代化

（殖民化）。此刻，新一波的國族同質化推動了族群政治的簡化主義，族群身分立刻和關懷本土與否、和認同國家與否畫上了等號。

由於震盪文化場域的政治簡化主義在台灣政局的急速轉型重組過程中挾帶了強大的認同壓力，連朱天心本人也在最近的一些自述中透露出一股強烈的焦慮（註九）。簡略的來說，朱天心感覺反對運動人士似乎在質問朱天心「認不認同台灣，愛不愛台灣」之時，實際上是要求朱天心書寫某種題材的文學創作，陳述自己的「本土」經驗以作為表態。對於此種類似「自白書」的寫作，朱天心表示不願也不屑。但是，表達負氣的拒斥並沒有稍減朱天心的焦慮，反而在一篇篇的自述中更顯其強度，這很耐人尋味。

我覺得朱天心的強烈焦慮來自她對「立場正確」的一貫渴望；換句話說，正因為朱天心不願被視為真正異議的、邊緣的，而總希望與主流（不管是過去的國民黨還是現在民進黨所代表的主流）站在一起，所以才會在不同情境中，主流聲音發出質疑時感到焦慮。讓我提出以下兩個例證。

朱天心在〈去聖邈遠，寶變為石〉的自述中承認，鄉土文學論戰時由於文化圈內頗為明顯的進步傾向，作家及其作品應與社會、與下層弱勢人民保持某種密切關係，形成了圈內判定文學價值的主要標準；面對此種鄉土掛帥的論述，朱天心自述「遂變得十分焦慮」，因為她認為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背景——「她的都會中產「鄉土」——沒有辦法提供合適的資源來寫「合於」論戰標準的作品。這種追求「合於（主流）」的動力就是朱天心焦慮的來源。

時至九〇年代，當所謂的「本土」經驗挾帶著強烈的福佬族群色彩，形成文化圈內主流的標準時，朱天心發現，她的外省眷村「鄉土」又被排在「本土」之外，她又有可能無法「合於」標準了。於是，焦慮再起，朱天心在不同的場合一再祭出身分中「既紅且專」的成分——由大舅到外公到女兒，不斷提及童年時的客家經驗，最後還預留伏筆地承諾以三十年的時光來孕育她的「本土」作品。

由這分揮之不去的焦慮來看，朱天心是很害怕被遺留在「主流精英」之外的，而弔詭的是，這分不情願自居邊緣的焦慮恐怕正源自眷村文化長久以來自居的一種「想像的中心觀」。

什麼是眷村文化特有的「想像的中心觀」呢？朱天心在她一九八一年的眷村小說《未了》中提到眷村居民如何在與村外人相較後建立自我定位。他們通稱村外的人為「老百姓」，這種叫法「有些輕視的意思，有些憐惜，又有些洋洋自得，像是老兵們的心情，自己真是戍守前方保鄉衛國的英勇戰士啊。」一九八一年朱天心筆下的老兵心情當然不是九〇年代露宿香港機場或是走上街頭擁擠的悲涼心情，而是一種與國家同命，與政權共生的自傲，是一種在所有教科書、愛國歌曲、通俗意識形態中不斷衍生強化的「命運共同」感覺。這種與當權者生命相連的一體感是掩蓋眷村一貫邊緣地位的重要意識形態；而正是因為朱天心有這種「想像的中心觀」，所以才會在族群論述中遭受質疑是否愛鄉愛國（即站不站在中心）時，產生巨大的焦慮。

雖然深深陷於八〇、九〇年代台灣社會急劇變化、權力結構快速重組的推擠拖拉中，朱天心卻是有

本錢不隨主流論述的音樂踏步的。她已用最近幾年的圓熟作品展現了不凡的小說技巧，也在題材的選擇上證明自己有能力捕捉歷史社會的脈動，更不乏對邊緣弱勢畸零人物有敏銳而同情的理解。若能進一步在踏出方舟後捨棄圍繞方舟的想像中心位置，那麼必然更能施力營造洪水後的天地。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人間周刊」

附註：

註一：在目前的社會脈絡中，朱天心的《擊壤歌》和《方舟上的日子》最引人注目恐怕是那一群女孩子之間濃得令人側目的同性（戀）情誼，而這方面的描寫又以後者中的〈浪淘沙〉最為耐人尋味。

註二：詹愷苓，〈浪漫滅絕的轉折〉，一九九一年一月六、七日自立早報副刊。

註三：洋父，〈是政治冷感還是性冷感——談朱天心《佛滅》〉，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十四日自由時報副刊。

註四：何春鈺，〈荒原女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五日自立早報副刊。

註五：呂正惠，〈不由自主的小說家〉，一九九二年六月「島嶼邊緣」第四期79～83頁。

註六：朱天心在「光華雜誌」的專訪中自承「這六個畸零族群完全是出版社集結出來的，我自己並不是

這麼有意識地找尋六個族群，作他們的代言人。」一九九二年七月第十七卷第七期93頁。

註七：見朱天心的〈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時晚報副刊，以及她在「中外文學」舉辦的座談會中的發言，〈混聲合唱——台灣各族裔作家對談紀實〉，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二十一卷第七期6～47頁。

註八：邱貴芬，〈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閱讀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中外文學」一九九三年八月第二十二卷第三期，94～110頁。廖咸浩對邱貴芬的論點提出一連串的挑戰，見同期111～115頁。

註九：朱天心，〈夏日煙雲〉，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去聖逸遠，寶變為石的挑戰〉，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